
 論 著

《婦女雜誌》與日本女性： 「同為女人」在近代東亞的意涵^{*}

須藤瑞代^{**}
張瓊方(譯)

摘要

《婦女雜誌》在創刊初期給予日本女子很高的評價，然而到了 1920 年代，對於日本女性的評價突然降低了。恰巧，1920 年代也是日文著作大量被翻譯成中文的時期。本文將分析《婦女雜誌》十七年刊行期間的日本女性觀的變遷，並從中考察 1920 年代的日本女性評價低落的原因。

透過分析《婦女雜誌》中展現出的日本女性觀，可以思索東亞社會中「同為女人」的意涵。中國女性和日本女性的「同為女人」意識的建構，並非如向來所說的，僅單純地因為兩國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尋求兩國女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的事實。該雜誌導入西方女性所面臨的問題，而將日

* 本文乃是大幅改寫拙稿〈從《婦女雜誌》看中國言論對日本女性的觀感〉([韓國]《中國史研究》，第 20 輯 [2002 年 10 月]，頁 277-291)而成。並且接受了石川照子女士諸多建議，謹在此表達謝意。

** 日本菲律斯女學院大學兼任講師

本女性重新建構成為面臨共同挑戰的同志。就這樣，一方面內化西方的女性主義，一方面也塑造了東亞社會的「同為女人」的形象。

透過這樣的分析，本文將考察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清末的女性解放論是把女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體，然而 1920 年代的《婦女雜誌》則是將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分離。如此一來，「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才能超越國界和民族主義，而「同為女人」。

關鍵詞：《婦女雜誌》、女性、日本、性別

一、前　　言

《婦女雜誌》的特色之一，就是翻譯、引介海外的思想，大量刊登介紹各國女性情形和動向的文章。我們在《婦女雜誌》上也可以看到許多翻譯或編譯自日文著作的文章，以及有關日本女性處境與女權運動的報導。很有趣的是，1920 年代《婦女雜誌》開始從日本大量地引進新思想的同時，對於日本女性的評價突然降低了。筆者將分析《婦女雜誌》從創刊到停刊，為期十七年間（1915-1931）的日本女性觀的變遷，並從中考察 1920 年代對於日本女性評價低落的原因。

《婦女雜誌》中與日本有關的文章可分為三類：(1) 日文著作的翻譯（日本人執筆，中國人翻譯），(2) 介紹日本的文章（中國人執筆），(3) 一位名叫竹中繁的日本女性（東京朝日新聞社第一名女性記者）以中文書寫的 11 篇投稿文章。其中，翻譯自日文作品的中文文章份量最多，關於這部份的研究已有不少。¹ 由於這些研究以新思想的引介為焦點，大多重視日本率

1 例如，西槙偉的〈一九二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戀愛觀の受容と日本—《婦女雜誌》を中心に〉，東大比較文學會《比較文學研究》，號 64（1993 年 12 月），頁 71-90。白水紀子的〈《婦女雜誌》における新性道德論—エレン・ケイを中心に—〉，《橫濱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學文學》，號 42（1995），頁 1-19。除此之外，以《婦女雜誌》為題材的相關研究，則有周敘琪的《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此為透過《婦女雜誌》來分析探討 1910 年代至 20 年代女性處境的論文。

先於中國引進新思想這一點。

然而，在觀察《婦女雜誌》所呈現的日本女性形象，我們發現，雖然該雜誌在創刊初期對於日本女子教育的發展給予很高的評價，然而到了1920年代，該雜誌突然開始報導日本女性在新舊思想中有多麼苦惱等問題，加上女權運動也沒有顯著的成效，因此其名聲一落千丈。恰巧，1920年代也是日文著作大量被翻譯成中文的時期，而到了《婦女雜誌》停刊之際，這樣的日本女性形象並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婦女雜誌》是「中國婦女報刊史上第一份歷史最久的大型刊物」，除了總發行所——商務印書館的所在地上海之外，北京、天津、奉天、澳門、香港等28個城市都有販賣，同時「近代婦女期刊中，發行面這麼廣的，它是獨一份」。² 從讀者人數的規模來看，不難想像《婦女雜誌》對於當時中國婦女的日本女性觀的定型，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到目前為止，有關近代中國女性與日本女性關係的研究，多半以留日中國女學生為主題。³ 處理日本觀感的研究非常罕見，就筆者所知，僅有石川照子的〈中國YWCA(女青年會)の日本觀〉⁴ 一篇而已。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史向來被定位在本國歷史之內，很少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去研究的緣故。⁵ 近年來，日本女性史研究者開始嘗試著「從性別(gender)的觀點對近代國家——日本進行歷史解釋」。⁶ 這個從性別的觀點重新檢討一國歷史的新嘗試，可說是對於長久以來女性史結構的挑戰。同時，從國際關係史的角度重新檢討一個國家的女性史，也有其必要性。而對於日本女性觀感的檢討，也可視為這一連串嘗試中的一環。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卷5，頁351。

3 有關中國女子留學生的研究非常多，在這裡只提到周一川，《中國人女性の日本留學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2000）。

4 石川照子，〈中國YWCA(女青年會)の日本觀〉，收入歷史學研究會編，《歷史學研究》，號765（東京：青木書店，2002年8月），頁25-34。

5 與現代國際政治有關的研究，可以 Sandra Whitworth 著，武者小路公秀（監譯者代表）《國際ジェンダー關係論—批判理論的政治經濟學に向けて》（東京：藤原書店，2000）等為代表，然而其研究對象限定在當代。

6 井桁碧，《「日本」國家と女》（東京：青弓社，2000），頁14。

筆者認為，透過分析《婦女雜誌》中展現出的日本女性觀，可以思索東亞社會中「同為女人」的意涵。⁷《婦女雜誌》中，標題涉及國家或地區名稱的文章，其出現的頻率如下：

國名	美國	日本	俄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非洲	菲律賓	朝鮮	馬來亞	墨西哥
文章數	132	83	53	47	28	19	5	4	3	2	2

從上表可見，美國出現的頻率明顯偏高，其次依序為日本、俄國、英國、德國。相較於西方國家，以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國為題材的文章則非常稀少。雜誌關注的焦點多半集中於歐美各國，亞洲國家當中，只有日本受到高度矚目。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中國女性和日本女性的「同為女人」意識的建構，並非如向來所說的，僅單純地因為兩國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接近。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近代東亞社會中「女人」意識如何被型塑的問題，而且必須注意到，那段時期的《婦女雜誌》，一方面通過日文等著作內化西方的女性主義，一方面也塑造了東亞社會的「同為女人」的形象。

二、《婦女雜誌》初期所見的日本女性觀

《婦女雜誌》的風格，在其十七年的發行期間，隨著編輯人員的更迭，數度出現變化。Jacqueline Nivard 將其劃分為 (1) 草創期 (The Beginning,

7 岡真里在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研究當中，針對第一世界女性在對於本身「第一世界性質」毫無自覺的情況下，強調「女人」受到壓抑的普遍性這一點提出質疑。本文即基於此一問題意識，引用「同為女人」一詞。這一部份請參考岡真里所著的〈「同じ女」であるとは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フェミニズムの脱構築に向けて—〉，收入江原由美子編，《性・暴力・ネーション》(東京：勁草書房，1998)，頁 207-256。

1915-1919 年)，(2) 成長期 (The Taking Off, 1920-1925 年)，(3) 復古期 (The Reaction, 1926-1930 年)，(4) 再興期 (Tentative Revival, 1930-1931) 年等四個時期。⁸ 而從日本女性相關的文章也可看出，其介紹的內容也幾乎順應著這個時期劃分而轉變。

《婦女雜誌》在草創期 (1915-1919) 的論調，有著強烈的以培養賢妻良母為目的之傾向。當時的中國面臨了辛亥革命前聲勢高漲的女權運動於革命後爭取女性參政權失敗的挫折之後，保守反動氣氛瀰漫的時局。雖然《新青年》的創刊 (1915 年) 所象徵的新文化運動也於此時展開了，然而，《婦女雜誌》卻一直堅持保守論調。刊登的文章著重於造福其鎖定的讀者群 (賢妻良母與其後備軍) 的目的，文章取向也偏重於充實家政、科學、衛生等實用的知識。

而此一時期，介紹日本的文章寥寥可數。其特徵為，主要的三篇文章都以日本女性的職業為題材。文章中具體地介紹了日本的女店員、鐵路事務員、美容理髮小姐、護士和女記者等等。此外，也提及日本女性愛乾淨的習慣、女子教育的發展程度，都是中國無法匹敵的，同時還指出日本女性的愛國心特別強烈等特色。⁹ 從文章數不多的這一點來看，似乎《婦女雜誌》對於日本女性的興趣並不高，然而就其對日本女性的評價而言，仍認為日本女性比中國女性進步一點。至於翻譯自日文的作品，則幾乎不見思想層面的文章，內容多半偏重於科學、衛生等方面的知識。

清末以來，中國對於日本女性的評價，始終與日本的國力密不可分。關於這一點，從梁啟超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等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

8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iu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p. 37-55.

9 允梅、蔚南，〈我之日本婦人觀〉，《婦女雜誌》，卷 5 號 1 (1919 年 1 月)。

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¹⁰

梁啟超認為，男女平等論和女子教育都與國家的富強與否密切相關，因此日本可視為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這裡所顯現的女學發展先進國家的日本形象，也是促使許多中國女性留學日本的理由之一。譬如，秋瑾就曾為文勸導中國女性赴日留學，「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強也？」¹¹

至於 1912 年中華民國建國後的日本女性觀，僅從 1915 年到 1919 年的《婦女雜誌》所登載的文章來看，雖然已經不如清末時期那般對日本有強烈憧憬，但仍繼續對日本女學先進的部份給予以正面的評價。需要注意的是，在《婦女雜誌》的文章裡，看不出日本國家與日本女性之間有任何矛盾的關係，日本國家跟日本女性被認為是一體的。而這兩者之間的分離是從這個時期以後才逐漸開始的。

三、落後的女性運動・自殺的女性

如上所述，認為日本女性具有先進色彩的看法，在《婦女雜誌》的「成長期」(1919 年 11 月—1925 年 8 月)，出現了巨大的變化。1919 年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思想界與知識界都明顯地蓬勃發展，在此風潮之下，《婦女雜誌》被批評為「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¹² 因此從 1921 年 1 月號起，雜誌封面全面改版。編輯改由章錫琛出任，隨著他的編輯方針，《婦女雜誌》整體的論調也出現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光從此一時期的特輯便可看出，諸如「節育專號」(卷 8 號 6)，「貞操問題討論」(卷 8 號 12)，「婦女運動專號」(卷 9 號 1)，「娼妓問題專號」(卷 9 號 3)，「家庭革新專

10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時務報》，冊 23、24 (1897 年 4 月 12 日、5 月 2 日，《飲冰室文集之一》)。

11 秋瑾，〈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女子世界》，第 2 年第 1 期，1905 年 6 月；轉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33。

12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號 4 (1919 年 4 月)，頁 627。

號」(卷 9 號 9)，「配偶選擇專號」(卷 9 號 11)，「十年紀念專號」(卷 10 號 1)，「男女理解專號」(卷 10 號 10)，「新性道德專號」(卷 11 號 1)，「女學生專號」(卷 11 號 6)，在在皆是深入自由戀愛與性，且極富挑戰性的議題。

如同 Nivard 所言，此一時期的《婦女雜誌》也陸陸續續地刊登與謝野晶子、有島武郎、長谷川如是閑、本間久雄、生田長江、堺利彥和山川菊枝等著名日本女性主義者的文章。¹³ 從先前的研究可知，《婦女雜誌》當中關於自由戀愛和性的討論，多半都跟譯自日文的文章有關。

譬如西楨偉認為，「他 (主編：章錫琛) 藉由日語這個工具，即時掌握同一時代日本的資訊，並且透過厨川白村、本間久雄等人尋求女性問題的理論依據。」¹⁴ 另外，章錫琛等人以日本的戀愛理論為參考之最大的理由是「因為日中兩國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時候，雙方皆具備了以儒教為文化基礎的共通點，因此，早一步接觸到西方文化的日本，其所持的理論，對於中國方面的問題，也可以立即派上用場。」¹⁵

除此之外，白水紀子指出，在日本當時有很多人介紹了愛倫凱 (Ellen Key, 1849-1926) 的思想；但在中國，「要說愛倫凱的引介是由《婦女雜誌》一手包辦的話，一點兒也不為過。甚至連其他雜誌上所登載的有關愛倫凱的討論或介紹，也幾乎全出自於該雜誌成員之手。」¹⁶ 白水紀子還提到，《婦女雜誌》把日本所接受的愛倫凱思想經過翻譯，再度介紹到中國，而且他們還特別對本間久雄所持的愛倫凱觀點感到興趣。

簡單地說，以上兩篇論文都認為，日本戀愛觀等的前衛性，或是率先接受西洋新思想的部份，是吸引《婦女雜誌》執筆者的特質，並大量翻譯日本作品的理由。

13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40.

14 西楨偉，〈一九二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戀愛觀の受容と日本〉，東大比較文學會《比較文學研究》，號 64 (1993 年 12 月)，頁 71。

15 西楨偉，〈一九二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戀愛觀の受容と日本〉，東大比較文學會《比較文學研究》，號 64 (1993 年 12 月)，頁 88。

16 白水紀子，〈《婦女雜誌》における新性道德論—エレン・ケイを中心にして—〉，《橫濱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學文學》，號 42，頁 2。

然而，觀察該雜誌在同一時期介紹日本女性的文章後可知，雖然文章篇數激增，但是對於日本女性處境的評價卻明顯降低。《婦女雜誌》一方面從日本大量地引進新思想，另一方面卻認為日本女性的處境「落後」。接下來，筆者將一一介紹《婦女雜誌》特別費心報導的日本女性運動，以及日本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內容。

(一) 日本的女性運動

首先，綜觀《婦女雜誌》所刊登的文章內容可知，其對於當時日本女性史研究專書中提及的主要之女性主義者與女性團體，幾乎是逐一引介，而且內容鉅細靡遺。但是，如同祁森煥在 1923 年所言，「日本的婦女運動到了現在總算有發展的希望了！」¹⁷ 一般認為日本的女性運動到近幾年才算開始發展。即使他們對活動的活絡持肯定的態度，卻不認為已到達「先進」的地步。

祁森煥首先將日本女性運動的初期階段定位為「文化運動時代」，並介紹樋口一葉與福澤諭吉兩人。他指出，「福澤氏婦女論的主題，不出乎上流家庭的婦女以外，那些勞動婦女職業婦女中流以下的婦女，一句也沒有說到，這是可注意的。」¹⁸ 另外，他還介紹了與謝野晶子在《明星》(新詩社發行的雜誌) 上的投稿，以及她所出版的俳句歌集《亂髮》。關於平塚明子(雷鳥)參與的青鞆社，他則提到「青鞆派的活動甚短，其主張亦幼稚不徹底，但因此而日本婦女才知道運動的真義和其中心思想。」

《婦女雜誌》也介紹了婦人矯風會、生活改善會、新婦人協會的活動，並說明了「新婦人協會成立最遲，而活動亦最著。發起者為著名新女子平塚明子，其主旨旨在謀日本全國婦女之聯合運動，以達男女平等之目的。」¹⁹

17 祁森煥，〈日本婦女運動的過去和現在〉，《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18 祁森煥，〈日本婦女運動的過去和現在〉，《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另外，關於樋口一葉的描述，這裡提到她出身於貧困的家庭，然而正確地說，應該是她生於堪稱富裕的家庭，但是因父親過世而家道中落。以下述及日本女性團體的活動內容時，也可散見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記載(例如，文中寫到與謝野晶子創立新詩社，然而實際上是她的丈夫與謝野鐵幹創設的，諸如此類的錯誤)，在此不做討論。

19 SV，〈日本婦女之拒婚同盟〉，《婦女雜誌》，卷 7 號 5 (1921 年 5 月)。除了平塚

新婦人協會向議會提出了兩份請願書，其內容包含了要求修訂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女性參與政治結社及政治集會，與限制女性成為集會結社發起人的條文，以及建議在民法中加入針對患有性病的男性訂出結婚限制的條文。

《婦女雜誌》對於此類的活動也都鉅細靡遺地報導，並刊登了請願書的全文及平塚明子的照片。

繼新婦人協會之後，受到矚目的是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赤瀾會。

赤瀾會的成立，在本年 [1921年] 四月中旬；會員全是婦女。

但她們卻不像從前的婦女運動，祇立在婦女的地位，和同是被虐的男子們挑戰，她們完全立在無產階級的地位，和那虐待男子婦女的資本階級權力階級挑戰。這種徹底自覺的行為，實在日本婦女素來沒有的。²⁰

另外，在別的文章中也指出，「婦女運動之潮流有二，一為妥協的改良主義的議會政策，一為激烈的勞動運動。」²¹ 至於日本的婦女運動，前者可以新婦人協會為代表，後者則以赤瀾會為代表。新婦人協會的平塚明子和市川房枝等人屬於第三階級，而社會主義者的山川菊榮、伊藤野枝、堺真柄等人則屬於第四階級。之後，新婦人協會由於內部思想不一致的緣故而解散，接著成立的是婦人聯盟。²²

提到山川菊榮的軼事，《婦女雜誌》裡有一位筆名叫 Y.D. 的記者，他曾親自到山川菊榮的家中進行單獨採訪。²³ 採訪的內容似乎非常簡單，山川在面對記者時，強調了勞工運動的重要性，而被問及有關中國的問題時，她似乎對此不太清楚，只提到應該不能放棄農村的問題。

這次的採訪很有趣的是，Y.D. 雖然專程前往日本訪問山川，但他得到的結論卻是：「經這次調查的結果，覺得日本的婦女運動方面，可以使我

明子之外，市川房枝、奥むめお也是該組織的核心人物。

20 紫瑚，〈日本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卷 7 號 10 (1921 年 10 月)。

21 祁森煥，〈一九二一年日本之婦女界〉，《婦女雜誌》，卷 8 號 3 (1922 年 3 月)。

22 祁森煥，〈日本婦女團體的變動〉，《婦女雜誌》，卷 9 號 3 (1923 年 3 月)。

23 Y.D.，〈日本婦女團體及婦女運動者訪問記〉，《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們效法的雖然不多，但她們所以不振和失敗的幾個原因，卻很足以供我國婦女運動者的參考。」²⁴ 他認為日本的例子，對於中國的女性運動有幫助的並非日本先進的部份，而是「其不振和失敗的原因」。他所言之日本的女性運動的問題點包含（1）日本女性的經濟大權被男性奪取的情況，（2）女性運動本身也有個人化的傾向，（3）就連運動的領導人的身體狀況都不是很健康，（4）女性同志必須具有同情心，（5）也必須實行有組織的運動等五點。

《婦女雜誌》對於日本女性運動的評價過低，在與其他國家女性運動的評價比較之下，更加明顯。所謂女性運動的先進國包括，以透過女性參政來解決所有問題為目標的英國與美國，還有以母性保護為最終目的之德國與斯堪的納維亞諸國。²⁵ 至於俄國也因其女性參加革命而獲得肯定，不過對於法國的評價則十分苛刻。

法國婦女現在的地位與境遇，固稍遜於美國；而她們在最近的運動也不能像英國婦女爭參政權與俄國婦女參加革命的那樣
哄 [轟] 動一時，以致講世界婦女運動的人頗有淡焉忘之的樣子。²⁶

即使如此，相對於法國，「我們沈淪在黑暗地獄中的東洋婦女，則對於她們猶不能望其肩背」，²⁷ 「不用說，日本的婦女運動，比較歐美各國，原是十分幼稚」。²⁸ 總之，他們認為英國、美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俄國較為先進，其次為法國，而日本和中國則遠遠落後於這些先進國家。

在此，我們看不到如同清末的梁啟超那樣，認為國力興衰與女性地位成正比的看法了。受到關注的不再是國家本身，而是透過把焦點聚集在國

24 Y.D., 〈日本婦女團體及婦女運動者訪問記〉，《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25 健孟，〈德國及其斯堪的納維亞的婦女運動〉，《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26 張梓生，〈法國婦女運動小史〉，《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27 張梓生，〈法國婦女運動小史〉，《婦女雜誌》，卷 9 號 1 (1923 年 1 月)。

28 紫瑚，〈日本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卷 7 號 10 (1921 年 10 月)。

家裡的「女性」處境的方法，將對國家與女性的認識分離開來。這樣的「分離」，也是《婦女雜誌》執筆者所關心的另一個議題；在描寫日本女性所面臨社會問題的文章中，這樣的表現更為明顯。

(二) 日本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說到日本的女性運動，即使是「不振」，但如果肯定其以促進女性發展為目標的積極面，日本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則可視為消極的一面。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當中，尤其以自殺、殉情受到最大矚目，甚至還有「日本是自殺案件最多之國」這樣的說法。²⁹

例如，由中條百合子所創設的婦人同情會，在自殺發生率最高的須磨鐵道旁架設了告示牌一事，也連同相片一起被刊登。告示牌上寫道「凡有不得已事故要自殺的，請略等一等。到婦人同情會裡談一談！一定可以替你設法。」³⁰

此外，給日本社會帶來巨大衝擊的有島武郎與《婦人公論》記者波多野秋子的殉情事件，也被詳盡地報導。³¹ 不光是有島與波多野殉情的來龍去脈，就連他們兩人的遺書都被翻譯出來。以下是這篇文章的作者費哲民，針對日本驚人的自殺率，提出的統計與說明。

據一九二二年內務省的調查統計報告說，全國男女自殺數共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二人；自殺的原因約分四類，即（1）失戀；（2）癡情；（3）厭世；（4）生活困難。其中（1）（2）兩項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五，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風氣的一斑了。³²

根據他的描述，當時日本的自殺事件，多半以戀愛問題為主因。然而，這個統計數據並不正確，當時日本自殺的原因當中，與戀愛有關的理由，

29 〈日本自殺防止運動〉，《婦女雜誌》，卷7號2（1921年2月）。

30 〈日本自殺防止運動〉，《婦女雜誌》，卷7號2（1921年2月）。

31 費哲民，〈震動日本的有島武郎情死事件〉，《婦女雜誌》，卷9號10（1923年10月）。殉情事件發生於1923年6月9日，而《婦女雜誌》在同年10月號的雜誌裡也對此做了報導。

32 費哲民，〈震動日本的有島武郎情死事件〉，《婦女雜誌》，卷9號10（1923年10月）。

即使涵蓋了殉情、癡情、私通懷孕、失戀等等，也不及整體的 10%。³³ 在此，與其批評他的消息不確實，不如檢討為何他的報導要指出日本的自殺相當頻繁，而且多半以戀愛為原因。他之所以特地引用統計數據，是為了證實像有島武郎與波多野的殉情事件，在日本並非罕見。

除此之外，《婦女雜誌》也介紹了濱田榮子的自殺案例。這個事件的主要內容是，濱田榮子不想跟她母親決定的對象結婚，而與她所愛的表哥同居。她的母親基於血緣相近的理由，反對這樁婚姻。結果榮子選擇服下滅鼠藥自殺來了結。³⁴ 對於這個事件，Y.D.表示：

在這新舊思想交替的時候，舊家庭中和受過現在教育的新婦女們容易各趨極端。現在我國像這篇所報告的情形的一定不乏其人，所以自殺的雖是一個日本婦女，我們竟可以借她來當作我們的犧牲者……。³⁵

也就是說，正因為像這樣的案例也很有可能在中國發生，所以被拿來當做參考與比較的題材。而且，《婦女雜誌》的執筆者對榮子的處境也寄予高度的同情。

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的「新舊思想的衝突」這個說法，儼然成為形容日本女性處境的關鍵詞。

日本婦人之逃走自殺（或情死）離婚等事件，日見之於報端，

33 根據筆者的調查，在內務大臣官房文書課編的《日本帝國國勢一班 9 第 40 回～第 42 回》(東京：クレス出版，1994)、《日本帝國國勢一班 10 第 43 回～第 45 回》(東京：クレス出版，1994) 當中，並沒有找到費哲民所引用的數據。假設他根據的是 1922 年發表的資料，其內容應該是 1920 年的統計，而當年日本國內的自殺人數總共有 13,347 人。如果費哲民所指的是 1922 年的統計，當年自殺人數則有 12,359 人，無論如何都與費哲民所列舉的 13,632 人不符。而且，自殺的原因當中，比例最高的並非失戀或感情糾紛，1920 年及 1922 年兩年都以「精神錯亂」及「病痛」為首。因「精神錯亂」、「病痛」而自殺的人數加起來在 1920 年有 6,538 人，1922 年有 6,027 人，高達每年總數的 49%。與戀愛相關的理由（殉情、感情糾紛、私通下的懷孕、失戀等），不管在哪一年所佔的比例都不及全體的 10%。

34 Y.D.，〈一個自殺的日本女青年〉，《婦女雜誌》，卷 7 號 10 (1921 年 10 月)。

35 Y.D.，〈一個自殺的日本女青年〉，《婦女雜誌》，卷 7 號 10 (1921 年 10 月)。

近日尤甚。考此事之背景，常在於新舊思想之衝突與經濟之間題。……此因日本婦人在社會之地位，向較男子為卑，人格亦不平等，相習已久，雖有覺悟者亦祇得取消極的手段而已。豈不悲哉！³⁶

除了對自殺的論述之外，類似這樣的說法也常出現在描述離婚的情形。例如，報導伯爵之女柳原白蓮離婚的文章當中，不但描述了她雖然嫁給煤礦業主伊藤傳右衛門，卻因厭惡缺乏愛情基礎的婚姻，而趁丈夫到東京出差時，寫了要求離婚的書信；作者還輕描淡寫地提到日本社會對這個事件的評論。最後，甚至引用了英國的勃拉克女士 (Dora Black) 對此事的看法，她認為「這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就知道東方社會，還是新舊交替的時代。」³⁷

綜上所述，《婦女雜誌》對於日本女性的觀感，雖然在創刊初期有其正面的評價，認為日本女性比較先進，但是在 1921 年雜誌版面更新後，呈現的日本女性形象，卻偏向於因為身處新舊思想交錯之際而苦惱的一面。這樣變化的原因何在？

筆者認為這與《婦女雜誌》編輯方針的轉變密切相關。該雜誌在進入「成長期」(1920-1925) 的階段之後，便放棄了之前賢妻良母主義的觀點，轉向著重於戀愛、性和以女性運動為中心的前衛論調，並且論述焦點集中於理想的女性形象上。內容主要是針對女性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想要努力達成的理想形象，從女性的立場出發，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也就是說，「身為女人」的意義已經不再等同於成為賢妻良母，而是意味著女人也能因戀愛、性等問題及困難，體認其存在的意義。總而言之，《婦女雜誌》中所呈現的「女人」的意涵本身產生了變化。

36 祁森煥，〈一九二一年日本之婦女界〉，《婦女雜誌》，卷 8 號 3 (1922 年 3 月)。此外，彭竹君的〈日本尚存原始時代的婚制〉(《婦女雜誌》，卷 14 號 7 [1928 年 7 月]) 一文，是將橋浦泰雄刊登在《向上青年》與《婦人公論》中的文章經過編譯而介紹的報導，本文中也提到「日本為世界上離婚有名的國家，這為日人自己所公認的」。

37 Y.D.，〈白蓮女士離婚記〉，《婦女雜誌》，卷 8 號 4 (1922 年 4 月)。

從日本引進新思想和對日本女性評價的低落，與《婦女雜誌》顯現出的女性問題意識的形成，幾乎是同步進行。新思想的引介，對於女性問題意識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引導女性運動的男女平等論、戀愛論和愛倫凱的母性主義等從外國引進的論點，在《婦女雜誌》被定位為「女性」所面臨的特定問題，並成為題材，要這麼說也不為過。根據這些新思想來看日本女性的話，自然她們所受到的壓迫就會受到矚目。

在引進以從壓迫中獲得解放為目標的新思想的同時，不也塑造了「受壓迫的女性」形象嗎？從中日兩國都具有「以儒教為文化基礎的共通性」³⁸ 這一點來看，這意味著構成「新舊思想」中「舊」的部份的要素是共通的。不過，視這樣的「舊」思想為「問題」的思維，則是由「新」思想所引發的。也就是說，比起以儒教為文化基礎的共通性，將舊思想視為「問題」的結構性共通點的重要性更高。

正因如此，日本女子教育的發展情形不再受到重視，《婦女雜誌》將焦點轉移到日本女性儘管因受壓迫而痛苦，卻仍然拼命地推動婦女運動的部份。在此顯示了，「被壓迫者」的普遍性就是作為「女人」的一個指標。日本女性的自殺被視為是「苦悶的象徵」，³⁹ 而祁森煥的文章也流露出對於她們的同情。

上述所言的身為被壓迫者的日本女性形象，一直持續到之後的「復古期」(1926-1930)。例如，仲華的文章介紹了日本民法的最終宗旨在於保障父權，因此妻子被定義為無權者。⁴⁰ 另外，沈連三則引用了河原稼山的意見，指出在日本的交通工具中經常看到女性打瞌睡的情況，日本女性之所以那麼喜歡睡覺的原因是，她們每天都得比丈夫早起，比丈夫晚睡，因此有睡眠不足的問題。⁴¹ 而《婦女雜誌》在復古期，隨著 1925 年 9 月杜就田繼任主編之後，再度回復到原先保守的版面，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文章也減

38 西横偉，〈一九二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戀愛觀の受容と日本〉，東大比較文學會《比較文學研究》，號 64 (1993 年 12 月)，頁 88。

39 祁森煥，〈一九二一年日本之婦女界〉，《婦女雜誌》，卷 8 號 3 (1922 年 3 月)。

40 仲華，〈日本婦女的法律地位〉，《婦女雜誌》，卷 16 號 12 (1930 年 12 月)。

41 沈連三，〈愛睡的日本婦人〉，《婦女雜誌》，卷 12 號 9 (1926 年 9 月)。

少了許多。雖然有關日本女性自殺等比較極端的報導減少了，但是對日本女性的評價依舊低落。換言之，仍然維持著將焦點聚集在受壓迫的情況之架構。

結果，《婦女雜誌》在最後一年（1931）時也指出，「日本女權的低落我們都已知道。而其癥結為民法刑法中偏於男權的條例未經改革，我們也曾談到。」⁴² 1921年雜誌改版後，日本女權低落的形象已經成為共識。

四、缺乏對於日中政治關係的關心

不僅於此，當時的日中關係對於《婦女雜誌》所抱持的日本女性形象幾乎沒有造成影響。為資比較，我們可以參考同樣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雜誌》（1904-1948），當時雖然也經常刊登有關日本的文章，不過內容多半是關於日本政治動向。⁴³ 可想而知，這是因為《東方雜誌》並非女性雜誌，而是綜合性的雜誌，讀者以男性居多。如同文章所描述，「近來國人都很留心日本情形。有的人說日本受新潮流的激動，會生出極大的變化。又有人說日本是中了軍國主義的慢性毒。這新潮流是一時的現象，終不能有大影響的」，⁴⁴ 「新潮流」和「軍國主義」成為眾所矚目的話題。

而《婦女雜誌》是透過自由戀愛與性等新思想的形式來認識「新潮流」的，至於「軍國主義」則可說是毫無涉獵。《婦女雜誌》所報導的是，殘存於日本社會之來自於舊思想的壓迫。在該雜誌幾乎看不到與「軍國主義」有關的言論，此乃因為執筆者都認為軍事是國家大事，更明確地說，它屬於男性的工作，而與日本女性毫無關聯。如同剛剛我們所討論的，《婦女雜誌》認為日本女性因受到男性的壓迫而飽嘗不平等的痛苦，並對日本女

42 竹中繁，〈日本民法及刑法的改正與女性權利的擴張〉，《婦女雜誌》，卷 17 號 8 (1931 年 8 月)。在這裡所引用的部份並不是竹中繁本人寫的，而是採自於《婦女雜誌》記者所撰寫的前言。

43 關於《東方雜誌》，請參考：若林正文，〈近代中國における綜合雑誌 —《東方雑誌》解題 —〉，《外國語科研究紀要》(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卷 26 號 4 (1978)，頁 1-117。

44 〈日本的新思潮與新人物〉，《東方雜誌》，卷 17 期 14 (1920 年 7 月)。

性深表同情。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日益高漲。而九一八事變前後，剛好是《婦女雜誌》持續登載日本女性竹中繁投稿文章的時期。根據 Nivard 對《婦女雜誌》的時代劃分，這個階段可歸於第四期—再興期（1930-1931）。⁴⁵ 竹中繁（1875-1968）是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第一位女性記者，她與市川房枝等人交往密切，是日本女性運動的靈魂人物之一。⁴⁶ 竹中繁於 1931 年 8 月到 12 月之間在《婦女雜誌》上投稿，前一年她剛好從東京朝日新聞社退休。

《婦女雜誌》還曾為文對她做介紹，說道「本文作者竹中繁是一位日本女子，她對於日本婦女的解放運動非常努力。今承她用極流暢的中文寫成這篇文字，寄給我們發表，使我們覺得非常欣幸。」⁴⁷

竹中繁投搞的文章內容擴及民法、刑法問題、教育、職業及參政權問題，還有在都市、農村、礦坑工作的勞工女性等。⁴⁸ 每一篇報導都針對日本女性的處境，引用統計數據或條例鉅細靡遺地介紹。例如，在〈日本廢娼問題〉（卷 17 號 9）一文中，從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廢娼的動機寫起，最早活動始於群馬縣，之後才發展成全國性的活動，而關於該運動的始末，都

45 如果將 1930 年的文章劃歸為復古期的話，1931 年有關日本的文章，除了竹中繁的投稿之外，就只有迪昂的〈日本京大醫院看護婦風潮的真相〉一篇（《婦女雜誌》，卷 17 號 5 [1931 年 5 月]）而已。

46 關於竹中繁的生平，可參考香川敦子所寫的傳記。竹中在女子學院受教育，31 歲的時候與鳩山一郎育有一個兒子，成為未婚媽媽（鳩山在此之後成為日本第 52～54 任的首相）。詳細的部份請參見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東京：新宿書房，1999）。但是，這本書中並沒有提到竹中繁在《婦女雜誌》上投稿的事。

47 竹中繁，〈日本民法及刑法的改正與女性權利的擴張〉，《婦女雜誌》，卷 17 號 8 (1931 年 8 月)。

48 竹中繁不會說中文，她在中國旅行時所做的筆記中曾透露出對於翻譯的感嘆，「既不會說俄文也不會說中文的我，真的感到很無奈。」（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頁 117）至於用中文書寫的能力，並沒有資料可供證明，所以無法推測。竹中繁的身邊有幾位中國留學生，也有可能是其中的哪位幫忙她撰寫中文稿。從《婦女雜誌》中提到「今承她用極流暢的中文寫成這篇文字，寄給我們發表」來看，暫時可以推測文章是由竹中繁用中文書寫之後寄去的。

具體地列舉日期及數據說明。而在〈日本首都職業婦女的調查〉(卷 17 號 12) 當中，有一段關於舊市街裡女工最多的敘述，提到「麹町三一四一人，日本橋二八一八人，京橋二二六七人……」，還舉出具體的人數。另外，就連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的比例也都以百分比標示。

從 1931 年 8 月開始的投稿，若受到當年 9 月的九一八事變影響，即使連載被中斷，並不足為怪。不過，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婦女雜誌》仍一如往常似地繼續刊登竹中繁的文章，而且一直持續到《婦女雜誌》停刊號的卷 17 號 12 (《婦女雜誌》停刊是因為 1932 年 1 月 28 日商務印書館與婦女雜誌社受到日本軍的轟炸，蒙受重大損失)。這可解釋為，比起國家之間的關係，《婦女雜誌》更重視「同爲女人」的立場。如同之前所描述的，《婦女雜誌》將日本女性從「日本」這個國家切離開來，並從「被壓迫者」的角度強調「同爲女人」的立場。換句話說，便是把雙方各自在其國內所面臨的性別不平等視為共通點。因此，中日兩國的政治關係和中日女性的關係是各自獨立的事情，對於日本這個國家應該表示抗議，對日本女性則無須詰問。

值得注意的是，《婦女雜誌》裡負責日本相關報導的記者當中，有許多是使用筆名而真實姓名不詳，而且男性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因此，我們會質疑，《婦女雜誌》裡所呈現的日本女性觀，是否純粹只是男性執筆者對日本女性的觀感，而想像中佔大多數的中國女性讀者或許對此另有看法。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竹中繁的例子也提供了很適當的題材。她在當記者期間，獲准以考察旅行的形式前往中國，當時曾與許多中國女性進行交流。從中國女性與日本女性交流的場面，也可一窺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成為雙方的共通點。

她是在 1926 到 1927 年間前往中國旅行半年，當時服部升子和她一起去了大連、哈爾濱、北京、天津、濟南、青島、上海、南京、蘇州、香港等主要都市。⁴⁹ 由於當時致力於收留中國留學生的服部的關係，行程主要

49 關於這趟旅程，香川敦子仔細地考證了竹中繁的筆記，並加以詳盡地介紹（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頁 110-141）。但是，刊登在《東京朝日新聞》以及《婦選》裡的文章並沒有被引用。

是以訪問各地的學校為中心，另一方面也與宋慶齡、熊希齡夫人、朱劍霞、劉王立明、廖冰筠（廖仲愷的姐姐）等著名的中國女性領導人進行交流。

1927年1月7日到25日的旅途期間，竹中繁停留在上海。她在訪問上海期間，與一位《婦女雜誌》的女記者碰面。⁵⁰ 筆者目前無法確認那位女記者究竟是誰，但是可以推測，這是四年後竹中繁開始在《婦女雜誌》上投稿的契機。

根據竹中繁於同年1月20日寄給《東京朝日新聞》的文章所寫：

來到當地，有機會與眾多的中國婦女接觸，我覺得自己似乎能夠體會現代中國婦女的心情。基於我們拜訪中國的契機，加上中國婦女們對於組織日中婦人會的期望，於是我們便著手進行各種研究。⁵¹

與那位記者會面之後，竹中繁拜訪了中國婦女協會。其後她們為竹中繁等人安排了聚會，竹中特別在集會上報告日本女性運動的情況。演講結束後，她們還針對「婦人運動，必須東洋同志相互扶持才行，日本女性的參政權目前已經上呈議會，以及提議組織日中婦人會等事，討論超過了四個小時」，⁵² 看來雙方氣味十分相投。

此外，據說，在《婦女雜誌》中撰寫〈女子參政與女子教育的普及〉一文的作者朱劍霞，在跟竹中繁第一次見面時跟她說，「我非常希望你們日本女性得到參政權。貴國女性獲得參政權就是我國女性所高興的事情。」竹中繁萬萬沒有想到，中國女性對於日本的女性運動那麼關心，且隨時注意它的動向，她曾表示，「我非常地驚訝，在日本婦女想到中國婦女之前，中國女性早已有人對我們日本婦女寄予關心了。」⁵³

50 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頁122。

51 竹中繁子，〈上海から〉，《東京朝日新聞》，1927年1月30日。登在文章最後的日期是1月20日。竹中繁刊登在《東京朝日新聞》上具名的文章，是以「竹中繁子」署名的。

52 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頁122-123。

53 竹中繁，〈民國女性の苦鬥の跡〉，《婦選》，卷6號10(1932年10月)。

中日兩國女性能夠產生聯手創立婦人會的想法，應該可說是因為雙方都已形成了「同爲女人」意識的緣故吧。在這裡可以確認的共通性，正是朱劍霞所說的「獲得參政權」的目標。就朝著這個目標而努力來說，竹中繁和中國女性一樣「同爲女人」。比起同樣是來自於儒教舊思想的壓迫本身，焦點應該更集中於共同達成目標的共識上。朱劍霞還寫了以下的文字交給竹中繁：「劍霞提倡主義及主張男女平等，十餘年來如一日，迄今愧未償素願，亟望東隣姊妹起而攜手促進也。」⁵⁴

中日兩國的女性，是朝著男女平等這個共同目標而邁進的「姊妹」。「姊妹」一詞，是中國國內呼籲女性同胞時常用的詞彙，也可以用於稱呼具有共同目標的同志。

竹中繁跟中國女性的交流是非常友好的，或許我們可說這是因為女性們積極利用國家內的男女性別差異，而形成了連帶意識。而《婦女雜誌》裡面所呈現的日本女性形象，不僅是雜誌上的形象，它同時也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當時中國女性的内心，要這麼說也不為過吧。

五、結論

岡真理在透過非洲女性的性器切除手術討論女性主義與法西斯問題的論文中提到，「女性主義將從『女人』的同質性出發這一點並沒有錯。但是，所謂的『同質性』究竟是什麼？」⁵⁵ 對於以西方的女性主義為基準來討論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主義，或普遍性的女性主義這一點，她深表憂心。

《婦女雜誌》在「成長期」(1920-1925)，開始從日本大量地引進新思想的同時，對於日本女性的評價也突然降低了。男女平等論、戀愛論與愛倫凱的母性主義等，有許多是透過日本引進的，而內容多半是西方國家裡本來就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到，雖然日本女性也被定位為面臨著同

54 竹中繁，〈民國女性の苦鬥の跡〉，《婦選》，卷6號10(1932年10月)。竹中繁所引用的是朱劍霞的中文文章。

55 岡真里，〈「同じ女」であるとは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フェミニズムの脱構築に向けて—〉，收入江原由美子編，《性・暴力・ネーション》，頁240。

樣的問題，但是這些「同樣的問題」是起源於西方世界的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

《婦女雜誌》並不只是在同處於東亞世界，以及同樣受到來自於儒教觀念、父權的壓迫這兩點上追求和日本女性的共通性，而是導入西方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本身，將日本女性重新建構成為面臨共同挑戰的同志。

換句話說，對《婦女雜誌》而言，女性要追求的並不是日中兩國的地理、歷史、文化方面的接近性，更重要的是要尋求兩國女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的事實。如前所說，即使《婦女雜誌》整體中，以西方國家與日本女性為題材的文章佔了很多，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介紹則是非常粗略，其原因應該是在於「同樣的問題」程度不同的關係。如果針對東亞社會受到儒教傳統文化的壓迫這一特點，來尋求女性同志的共通性，對於（當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朝鮮的關心程度應該會更高才對。相反的，積極地前往歐美各國視察不過是為了處理「同樣的問題」罷了。就這樣，《婦女雜誌》一方面內化西方的女性主義，一方面也塑造了東亞社會的「同為女人」的形象。

對照清末與民國時期女性形象的差異，清末的女性解放論在進化論思維的基礎上形成，是把女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體，被視為「弱勢」的中國女性形象，與對「強勢」女性的渴望並存。關於這一部份，筆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討論，在此不再贅敘。⁵⁶ 清末時期，中國女性的「弱勢」，並沒有因透過與中國男性的比較而獲得認同。例如，1903 年舉行的第五屆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中，「展示」纏足女性一事引發問題，還有人發表了「（中國人的）體魄脆弱，非由國民之母皆纏足之故哉！」⁵⁷ 的意見。然而，在這裡「衰弱」所指涉的是民族本身的衰弱，他們只是要歸咎於「國民之母」纏足的問題。

然而民國時期女性代表女性自己，她的受苦和壓迫被正視。本文所檢

56 須藤瑞代，〈消えていく李寶玉：1903 年「人類館」事件にみる新舊女性像の同時形成〉，《中國女性史研究》，號 12（2003 年 1 月），頁 1-14。

57 竹莊，〈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子世界》，期 3（1903）；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頁 637-640。

討的《婦女雜誌》採取的立場是，把日本女性與「日本」切割開來。確定中國女性與日本女性之間，共同面臨「同爲女人」的問題，形成一種連帶的關係，另一方面，幾乎完全漠視國際上的中日關係。也就是說，相較於清末時期民族主義優先於女性主義的立場，1920 年代的《婦女雜誌》是將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分離開來。如此一來，「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才能超越國界和民族主義而「同爲女人」。關於這一點，除了《婦女雜誌》，還應該對其他的雜誌或上海以外的區域做整體性的檢討。

李小江曾表示，「身爲東方女人，我感謝西方婦女，沒有西方女權主義大潮的衝擊，沒有西方婦女百餘年的群體抗爭，就不會有 20 世紀全世界婦女の覺醒」，其「覺醒」或許是意味著再度建構「同爲女人」的定義。⁵⁸向來以「解放」爲目標的單線性的近代中國女性史，也應該從正面來思考「女性」意義之轉變才是。

58 李小江，《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 102。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李小江，《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 周絞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 Sandra Whitworth 著，武者小路公秀（監譯者代表），《國際ジェンダー關係論－批判理論的政治經濟學に向けて》。東京：藤原書店，2000。
- 井桁碧，《「日本」國家と女》。東京：青弓社，2000。
- 內務大臣官房文書課編，《日本帝國國勢一斑 9 第 40 回～第 42 回》。東京：クレス出版，1994。
- 內務大臣官房文書課編，《日本帝國國勢一斑 10 第 43 回～第 45 回》。東京：クレス出版，1994。
- 周一川，《中國人女性の日本留學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2000。
- 香川敦子，《窓の女 竹中繁のこと—東京朝日新聞 最初の婦人記者》。東京：新宿書房，1999。

二、論文

- 白水紀子，〈《婦女雜誌》における新性道德論—エレン・ケイを中心に—〉，《橫濱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學文學》，號 42，1995，頁 1-19。
- 石川照子，〈中國 YWCA（女青年會）の日本觀〉，收入歷史學研究會編，《歷史學研究》，號 765。東京：青木書店，2002 年 8 月。
- 西槙偉，〈一九二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戀愛觀の受容と日本—《婦女雜誌》を中心〉，東大比較文學會《比較文學研究》，號 64，1993 年 12 月，頁 71-90。
- 若林正文，〈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綜合雜誌—《東方雜誌》解題—〉，《外國語科研究紀要》（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卷 26 號 4（1978），頁 1-117。
- 岡真里，「同じ女」であるとは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フェミニズムの脱構築に向けて—，收入江原由美子編，《性・暴力・ネーション》。東京：勁草書房，1998。
- 須藤瑞代，〈消えていく李寶玉：1903 年「人類館」事件にみる新舊女性像の同

時形成》，《中國女性史研究》，號 12，2003 年 1 月，頁 1-14。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i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p. 37-55.

The *Ladies' Journal* and Japanese Women: “*Tong Wei Nüren*” (“commonality as women”) in Modern East Asia

Mizuyo Sudo

Abstract

The *Ladies' Journal* (*Funi zazhi*) in its earliest issues highlighted the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women, but such favorable appraisals ceased in the 1920s. Coincidentally, the 1920s also saw many Japanese writing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changing views towards Japanese women in the *Ladies' Journal* over the seventeen years from its first issue to its last, and examines why Japanese women suddenly fell into disfavor in the 1920s.

From this analysis of the views towards Japanese women, we can also speculate what exactly the term “*tong wei nüren*” (“commonality as women”) meant as it circulated in East Asia. The ideology of “*tong wei nüren*” as constructed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women did not simply reflect the proximity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but resulted from the acknowledgement of women in both countries that they faced “common problems.” Indeed, the *Ladies' Journal* introduced the problems that Western women faced as their own on the one hand, and reconstructed Japanese women as comrades who faced similar challenges

on the other. As a result, it not only internalized feminism of the West, but also constructed the common image of women (i.e., “*tong wei nüren*”) that East Asian societies shared.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is essay furth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were inseparable in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However, the *Ladies' Journal* shows that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became detach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 1920s. As a result, “Chinese women” and “Japanese women” were able to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nationalism, and formed alliances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tong wei nüren*.”

Key Words: *Ladies' Journal*, women, Japan, gender